



薪传丛编

主编 陈思和

分册主编 周立民

给你们以晨星

复旦师生论巴金



安徽教育出版社



薪传丛编

主编 陈思和

分册主编 周立民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104

Supported by Shanghai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Project Number: B104

给你们以晨星

——
复旦师生论

马金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给你们以晨星: 复旦师生论巴金 / 周立民分册主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6

(薪传丛编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 - 7 - 5336 - 4755 - 1

I. 给… II. 周… III. ①巴金(1904~2005)—现代文学研
究—文集②巴金(1904~2005)—文学研究—文集
IV. K825.6—53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7341 号

责任编辑: 王竞芬

装帧设计: 吴亢宗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0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35.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3683078

总序

◎ 陈思和

安徽教育出版社约我主编一套能够体现复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丛书,我欣然答应,并将丛书取名薪传丛编。薪传者,不是强调个人的学术成就,而是体现复旦大学几代学人孜孜于某些领域言传身教,薪火传递的学术轨迹。丛编者,所体现的并非是一两种领域,而是多种领域,将分门别类,汇编成集。第一套是以人物研究为主题,编成四集:鲁迅研究论丛、巴金研究论丛、胡风研究论丛以及沈从文研究论丛。以后还将进一步总结前辈的研究成果,鼓励后来者的研究方向,一套一套编下去,弘扬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实绩。

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建立于19世纪50年代初,经几代学人努力,形成深厚的学术积累。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为本学科创始者,担任现代文学教研室第一任主任。当时共同组建学科的教授还有:文学史家唐弢、戏剧家余上沅、著名作家方令孺、近代文学专家鲍正鹄等,这些前辈们分别对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当下文学创作、戏剧五个方向都有精深研究和重要贡献,在当时名列前茅,在以后影响深远。此外,当时在中文系任教的著名教授中有陈望道、

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陈子展、吴文祺等前辈学者，他们或为 20 年代文学研究会成员，或为 30 年代左翼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或为最早的新文学史编撰者之一，他们的名字与学术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密不可分，他们的著述泽被后代。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代学术带头人整体崛起，潘旭澜教授研究当代文学，吴中杰、陈鸣树教授研究鲁迅，王永生教授研究现代文学批评史，王继权教授等研究和整理近代文学史料，皆有重大建树。他们承上启下，教书育人，为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尤其在学科资料的整理方面，贾植芳教授参与领导、主编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当代作家资料丛书》，都是穷当时全国学界之力集体攻关的大项目，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是全体教研室同仁努力合作的成果，至今仍然是本学科最严谨的工具书之一。潘旭澜教授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章培恒、王继权等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90 种）都是 20 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基础文献。

19 世纪 80 年代起，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巨变迭起。一是学科范围拓展，原来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相互隔离的状态被打破，自 20 世纪初贯穿到当下文学，形成了宏观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格局；二是吸收了来自西方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形成更加开放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在这种学术风气中，复旦大学该学科点始终居于潮流之先。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构成、重写文学史的提倡与论争、人文精神的追寻与讨论、文学史空间的开拓与发现、世界华语文学地图的拓展、文学与语言的综合研究与深入，等等，复旦大学学者的声音始终参与了本学科最前沿的理论创新与探索。这些成果对全国范围内的学科建设、理论创新都有直接的推动意义，也引起了港台和海外学术界的关注。



新世纪以来,本学科点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阶段。2004 年教育部批准陈思和教授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 年教育部又批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为搭建“复旦—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及世界华语语际文学研究国际学术平台”奠定了基础。在国内的人才引进方面,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正式加盟复旦中文系,领导了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2005 年获得了教育部审批的全国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点,将学院式研究与推动文学创作实践完美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当下文学创作尤其是海派文学创作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袁进教授、通俗文学研究学者栾梅健教授先后加盟复旦,恢复近代文学研究室,结合本系教师的原有实力,完成了近代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学科整合。由此,本学科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下文学研究的三个学术制高点。学术力量分布平均,学术梯队结构整齐。近年来,一批年轻的博士学有所成,先后通过留校、引进或回国,本学科点目前已有博士 16 名,其中博士后 3 名。从根本上完善本学科点的梯队建设,大幅度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在通俗文学与主流文学、文学史整体和作家个案、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学院研究与创作实践、中国文学与世界华语文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显示了毋庸置疑的学术优势。

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以外,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和文本细读。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大多数都能兼通现代文学经典和当下文学创作的双重研究,在现代文学经典方面,他们集中在鲁迅研究领域,形成了全国有影响的专家群体,同时,他们又对当下文学创作有广泛的兴趣和追踪的批评,如潘旭澜对杜鹏程的研究,吴中杰对柳青的研究,吴欢章对闻捷、郭小川等诗人的研究,在当时都是有影响的文

学批评实践。这些良好的学术风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被后辈学人所继承。我们从本丛编的内容中可以看到,贾植芳先生关于巴金研究的观点、胡风路翎研究的观点,传到了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再传到学生的学生的学生,至少形成了四代同堂的研究梯队。鲁迅研究从吴中杰、陈鸣树等前辈到青年学者邵元宝教授的学术历程中,取得了开拓性的发展,关于沈从文研究,吴立昌教授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现在又传到了张新颖、刘志荣等青年学者那里,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关心,从王蒙、宗璞到张炜、王安忆、余华、严歌苓、贾平凹等小说家,从绿原、牛汉、彭燕郊等老一辈诗人到第三代诗歌群体,将近四十多位作家的创作在复旦的本学科点都有专门的跟踪式的研究。这些自发形成的研究规模和持续不断的研究热情,形成了本学科点的一个鲜明特色。

我常常说,传统就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的信息,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以为这套丛编的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光大传统,继往开来,是我们的责任。希望丛编能够长期地出版下去,保存我们这个学科在每个阶段的学术研究特点和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2007 年 7 月 29 日于黑水斋



目录

总序(陈思和)	1
贾植芳:关于巴金研究的一束序跋	1

第一编 巴金思想解读

陈思和: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	
——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15
张业松: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	
——悼巴金并纪念鲁迅逝世六十九周年	48
唐金海:近百年文学大师论	
——兼论巴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原创性和杰出贡献	68
坂井洋史:读巴金	
——“违背夙愿的批判者”的 60 年	79

第二编 《随想录》研究

潘旭澜:关于《随想录》	99
-------------------	----

李 辉:《随想录》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102
李喜卿:《随想录》	
——寻找、恢复自我形象的过程	110
周立民:痛切的情感记忆与不能对象化的《随想录》	137
刘 涛:真话与记忆、声音、书写的关系	
——《随想录》语言观念研究	168
刘律廷:直面灵魂的浮躁与齷齪	
——写给巴金爷爷的信	187

第三编 多重视角下的巴金

孙乃修:巴金与屠格涅夫	203
陈思和 李 辉: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	235
山口守:巴金与萨珂、樊塞蒂事件	255
王友贵:巴金文学翻译初探	276
孙 晶:生命花朵的绽放: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293

第四编 感想与记忆

贾植芳:一点记忆,一点感想	309
王安忆:执绋者哀	313
张新颖:“你们是滚在无边的空间中,我也一样”	316

附录:

1. 复旦师生编辑、出版巴金研究资料与专著目录	320
2. 本书作者简介	325

编后记(周立民)	328
----------------	-----



关于巴金研究的一束序跋

◎ 贾植芳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后记

这部巴金研究资料专集，是我们从 1979 年间开始着手编辑的，中间曾就选文部分，印过一次油印本（共四册），作为我们的工作本，并分送有关兄弟院校中文系和有关人士，广泛征求意见。那里所用的材料，无论是作家自述性的作品，还是别人的评介文章，大半是以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刊为依据，比如巴金自己的作品，就是以解放后 5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 14 卷本《巴金文集》中的印文为准的。经过同志们的建议和我们自己的认真考虑，我们觉得这部资料既然是研究性的书籍，就应该从文献学的角度，或者说从历史的观点从事编辑工作。无论是作家自己的自述性作品的选录或是评论家的评介文章的收用，都应该严格地采用初次发表时的印文，这对探讨和研究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和努力的这位作家的生活、思想和艺术道路以及检阅这许多年以来我国评论界对他的评介研究工作的成绩或失误，那条

弯弯曲曲的历史过程和内涵,才有真正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也符合古往今来编辑研究性资料书籍的一般惯例。因为这部巴金研究资料专集,理应是巴金的文学生活历程和我国巴金评介研究工作的历史性的回顾和总结。有鉴于此,在这次公开出版的版本中,我们在编辑体例和要求上,做了新的努力,无论选用作家自述性的作品或他人的评介文章,我们都尽力选用初次发表时的印文;对于同一篇文章,如作者或评论者在不同的时期作过重大改动或注释的,我们也一并按文章出现的年代加以选用。我们尊重作家改动自己作品的权利,只是作为新的材料予以收录,用以显示历史的发展线索和时代风貌,它和这篇文章初次发表时的印文,并不是对立的存在,而是历史发展的新的表现。众所周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目录学和考据学的问题,如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和研究着的同一性质的问题一样,这也可以说是我国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历史性特点。这样,在编辑这部研究性资料集的过程中,比如评介文章部分,关于解放前的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力求选录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思想政治倾向和要求与不同文艺观点的评文,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以及错综复杂的中国思想文艺界的具体态势;解放后近 30 年的评文,亦复如此。比如 1958 年刮起的文艺学术界中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的“批判”巴金的文章,我们就选用了姚文元的两篇和一些在这股风浪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评文;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兴妖作孽时期出现的“革命大批判”声中“批倒批臭”巴金的那些“旗帜鲜明”的皇皇大文,我们也征得巴金先生和各方面的同意,选用了三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文章,用以说明这次“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灾害,在一个老作家身上的具体表现,那种疯狂性的迫害劲头。罗曼·罗兰说:“屠杀灵魂



的凶手是最大的凶手。”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是历史上的最凶恶的灵魂屠杀者。作为范例，选出几篇收在这里，实在具有刻碑立石的功用，不仅便利研究者的参照，更作为历史的见证，使我们这一代及后世子孙永远铭记这场“史无前例”的惨重教训。

作家自己的作品，我们也力求做到采用最初的印文，比如：1962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那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发表时多有所删节，这里利用的则是经过巴金先生鉴定的发言原文，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巴金的文学生涯已逾半个世纪以上，对他的评介研究工作，也几乎从他开始走上文坛时就开始了。历史跨度这么大，他的著译等身，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评介研究著作和论文，也随着年月的积累，范围广泛，材料比比皆是。这里收录的选文和著译系年部分，虽然经过巴金先生的校阅，纠正了我们那些失误不周之处，但全书的定稿，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修订和增补，谬误和遗漏，仍不可免，只能就我们的学养和力量所及，做出这样的努力而已。至于选文和著译系年编目与评介文章的编目，我们现时基本上以1980年为下限，1981年以后的资料，我们准备在本专集的第四册内独立收录和选辑。

巴金作品的外文译本及国外评介研究巴金及其作品的专著和论文，早在40年代初间，就开始发端，我们就目力所及，分类做了两个尝试性的编目工作，它离整体地反映客观实际，我们知道还有很大差距，收录在这里，只能算是聊备此格的存在。国外评介文章的选文方面，我们也就手头现有的材料当中选用了两篇，一篇是法国O·白礼哀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巴金》，(O. Brière: *Un Romancier Chinois Contemporain: Pa Kin*)，它出现于1942年，是外国学人研究巴金和他的作品的最早论文之一，富于文献意义，我们这里收录的是经过删节的已

有的译文,我们并已着手翻译全文,准备用在我们正在编译的《国外论中国现代文学》一书内,以存全貌;另一篇是请陈思和、李辉两位同学译的美国奥尔加·朗的那本出名的著作《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中的中国青年》(Olga Lang: *Pa Chin And His Writings—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一书之一章《巴金与西方》中的有关俄国文学对巴金影响部分,也是聊示一斑的意思。

1983年夏,复旦大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贾植芳主编,三卷本,其中第1~2卷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982年先后出版,第3卷因故未出。)

二、《巴金作品评论集》编后记

巴金,作为一个有独特的个人思想风格和艺术特色的作家,从他走上文坛以来,已逾半个世纪以上。无论从作品题材的开拓性和使用文学样式的多样性,或者说,从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而论,他都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处女作《灭亡》,在1928年问世时,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者叶绍钧就在该杂志的《最后一页》上予以引人注目的荐引,从而使巴金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也可以说,从这时起,他的作品开始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研究课题。随着他的文学事业的发展,评论文章亦层出不穷,虽无鸿篇巨著,但亦不乏富有见地的论述。30年代中期鲁迅对巴金的评价(见《答徐懋庸并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0年代中期郭沫若对巴金的论述(见《想起了樱桃树的故事》),都应该属于我们新文学批评史上对巴金创作的意义和价值的经典性的评价,为我们的巴金研究



工作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

在将近 70 年的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过程中,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它是人民和文学同时受难的时期。它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史无前例”的严峻教训。在艺术沦为神学的奴婢的时代,就像欧洲的中世纪,那里的人间生活实际上是一个“神、鬼、兽”的世界,没有文学,也没有文学批评可言,所以这一时期的所谓“巴金批判”的文章我们一概不收。直到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革命事业的复苏,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才呈现出真正的生命力和欣欣向荣的风貌,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工作才从吃足苦头的“左”的陷坑中站立起来,克服了和克服着那种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和从一时的政治需要出发的实用主义的文风,回到了面向历史和现实、实事求是的马克思文风上来,从那种长期形成的评论工作中的程式化、单一化和概念化的痼疾中解脱了出来,巴金研究的发展也出现了一派开拓性的学术景象,不仅研究课题更加深入和多样,评论方法也更合乎科学要求,既能从政治大处着眼,又能从艺术规律上探求,不仅有专论,更有专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的非凡气概。

我们从 1978 年起,组织力量,着手编辑《巴金研究资料专集》,使我们有机会与必要对巴金的著译事业和我国评论研究巴金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较有系统的细致的发掘和整理工作。现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印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评论集,我们不揣浅陋,承担了巴金评论集的编辑工作。我们已出版的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专集》,由于编的时间较早,所收材料以 1980 年为下限。事实上,这近四年来我国的巴金评介研究工作,更趋活跃,收获更多,在我国已开始形

成一支以中青年的研究者为主干的巴金研究专业队伍,有些高等院校已开设了巴金研究专题讲座。鉴于这种迅猛发展的新形势,现在这本评论集除选用了少量的发表于 30~50 年代的有学术意义的论文外,更着重选用了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发表的巴金研究新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这本评论集,既可看出我国巴金研究的历史成绩,有线索可寻,更可看出我国巴金研究的现实面貌和它的前进势头。我们希望通过对前天、昨天和今天的回顾,获得走向明天的信息。如果中外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通过这本选集,能历史地又现实地窥见我国巴金研究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愉快和满足。

巴金又是一个世界性的作家。据我们所知,早在 4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巴金译介研究工作,也获得了颇可注目的成就。为了反映这方面的实际,我们从手头上的材料中,选译了三篇论文收录在这里,也是藉一斑以窥全豹的意思。其中西方的两篇,日本的一篇。两篇选自刊物,一篇选自专著。

1984 年 7 月在复旦大学

(《巴金作品评论集》,贾植芳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年版。)

三、《巴金论稿》序

我国的巴金研究,几乎和巴金 1929 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活动的时间同步。建国以前的 20 年内,虽也不乏一些有见地的评介文章,但总的说来,并没有形成一种专题性的研究气氛,多半还停留在随感性的书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以反帝反封建为其总主题的新文学运动在旧社会处在一种受压迫的地位,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和它势不两立,在这个主要的政治障碍面前,不可能形成一支专业化的现代文



学研究队伍,更不可能形成一门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建国以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我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才正式得到确立,它作为一门专业进入高等院校课堂,这就为造成大批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化研究人才创造了条件,打下了根基。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从此得到了充分的开展,作家作品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巴金的研究,出现了专业化的新气象,这是一大可喜的历史性进步。在 50 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一些有学术分量的巴金研究论文,正表现了对现代文学以及作家作品的研究“正规化”的趋向。但好景不长,由于“左”的思潮的旋风越刮越烈,继 1955、1957 年文艺界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之后,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文化学术领域又掀起了所谓“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对于巴金及其作品以至前几年的巴金研究论著,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狂潮,而且延续近两年之久。虽然那是一次只触灵魂不伤及皮肉的批判运动,而且形式上还采取了争鸣的姿态,但那些由小文痞姚文元定了调子的千人一腔的以论代史的文章,和真正的思想分析和美学评价已相去甚为遥远了。历史也真喜欢和人开玩笑,甚至非常无情的玩笑。到了“十年浩劫”时期,中国又出现了第二次“文化围剿”,整个现代文学运动处于被“彻底砸烂”的命运。包括巴金在内的我国大小作家,同遭厄运,无一幸免。当时出现所谓“巴金批判”文章,实质上是一小撮文痞在林彪、“四人帮”的指挥刀下对文艺界实行“打、砸、抢”的具体表现,作家们陷于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的“辱之甚于杀之”的绝境,一一被打翻在地。在这样一切学术文艺学科都沦为神学的奴婢的时代,文学实质上也就灭亡了。当时的中国仿佛又步入了欧洲的中世纪,那是一个扼杀一切生机的黑暗历史年代。

历史步履艰难地走到 1978 年,祖国大地日月重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了对

长期危害我国社会进步的“左”的思潮和政策的深入批判，马克思主义又以其生气勃勃的真实面貌回到我们生活中来，这就为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生机，也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亮色，为真正实现双百方针扫除了故障，打开了长期淤塞的学术研究闸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巴金研究，开始出现了面目一新的气象，正式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的空气。近几年来，不仅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巴金的专论专著，而且更可喜的是，在我们学术队伍中，涌现了一批中青年有生力量，开始形成一支专业性的巴金研究队伍，这一景象是空前的。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巴金论稿》，就是两个青年人——陈思和、李辉同志，在新时期巴金研究工作中，经过艰苦的努力，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这本书原来拟名为《巴金前期思想和创作初探》，并非完全出于他们在治学和做人上的严谨和谦虚，虽然这是他们走上学术道路的基本信条；而主要是表明他们的研究的主题和领域是一些巴金研究工作中尚未触及或尚未深入的方面和内容，这就为这部新著带来了新的生命和信息。

陈思和、李辉两位同志，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招收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他们早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时期，就在广泛学习中外文史哲著作的基础上，潜心研读巴金全部著译，悉心搜求中外有关巴金研究的论著，他们参与了由我负责编辑的《巴金研究资料专集》、《巴金生活与创作自述》、《巴金评论选集》、《巴金研究在国外》等有关巴金的资料性和研究性的专书的编辑或翻译工作。因此，作为他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特色，是把自己的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之上，在吸取和借鉴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开拓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和中心。这就有助于清扫多年来在我国评论界成为风气的以论代史，

